

社会理论丛

第一辑

张一兵
周晓虹 / 主编
周 宪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辑

社会理论论丛

张一兵 周晓虹 周 宪 / 主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理论论丛. 第1辑/张一兵, 周晓虹, 周宪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1

ISBN 7-305-03784-2

I. 社... II. ①张...②周...③周...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190 号

书 名 社会理论论丛(第一辑)
主 编 张一兵 周晓虹 周 宪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73 千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305-03784-2/C·113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卷 首 语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一词取代了“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或者“有关社会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ety),而日渐成为世界学术圈中主流性的话语形式。这种视角(perspectives)的转换,大致有着以下的原因:

首先,主要源于欧洲的现代社会思想,经过偏好操作化和职业化的美国学术体制的改造以后,复又挟着美国现实政治之力量,几乎散布全球。而这种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实践及其结果,难免导致标准化而又琐屑化的枯燥数字,在复杂多样的现实面前,解释起来未免力不从心,甚至破绽百出。而欧陆诸国的学者,在抵制学术美国化的同时,也逐渐重整旗鼓,夺回社会科学创新的重镇地位。在克服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之间僵化的分工上,社会理论的提法无疑可以获得更为普遍的认可。真正的学科交叉,多种方法的兼容并蓄,也只有在社会理论的旗下才能实现。

其次,正统的社会学理论力图同哲学划清界限,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主张,无疑是奉实证主义为圭臬。实证主义之狭隘性,如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社会学理论历来强调自己的经验性,但对于日益流变不居的现实,局限于经验的知识,实难充当人类行动的认知标示(cognitive mapping)。再说,哲学本来就不可避免地缠绕在社会科学的上下。下者,为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者,则为之超越直接的客观知识而描绘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世界图景。倡导社会理论者,多是有意识地利用哲学思维来反思经验研究的局限,弥补经验陈述力所不逮之处。不过,社会理论绝不是要回到社会哲学的立场。统而言之,社会理论既是经验取向,又舍推论臆测成分,以能提供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视角为宗旨。

再次,社会理论的主张者,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探索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前所未有地成功克服了外在的限制,未来的一切,端赖乎人类自身的选择。社会生活的变化演进,不复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展开,或者是永恒规律的实现。在关系到人类前途甚至命运的问题上,社会理论可以呈递较为全面的参照框架,至少在参与话语竞争时,凸显一种社会思维(social thinking)。

另外,在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的时代,以国家为框架颇含实体意味的“社会”(society),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毋宁是以更为笼统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来概括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目前的形势下,一如国际格局的多元化,社会理论领域中也是歧义叠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理论也要比从研究西方现代性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更能涵盖发展的多样性形态。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准备以文集的形式,为社会理论提供一块有限的阵地,让同好者有表演的机会。对话和沟通是我们现实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希望在这块社会理论的园地上,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只要有讨论社会理论的兴趣,均可获得公平的对待。当然,既然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也不得不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尽管这种规则可能扼杀天才,埋没人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比具有明确规则更好的学术生产体制。所以,我们对于每份来稿,在经过编委会的初步审核后,适当者都要经过两位匿名阅稿人的评价,以确定刊登与否以及具体的修改意见。

本论丛每辑篇幅在25万字左右,初步设立以下篇目:

(1)专题研讨:主要就某个重大而有理论意义的话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探讨,既围绕一个核心,又集多家之言。

(2)学术论文:主题不限,无法纳入专题者即归其类,但学术标准则一样。

(3)海外文稿:在约请海外大家的专稿的同时,也接受其他海

外社会理论研究者的文章,以期了解国际学界的中心兴趣和发展趋势。

(4)学术随笔:包括与社会理论有关的学术造访、人生见闻、人物札记和感悟等等,力求文字活泼,可读性强。

(5)批评与回应:本篇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为书评,目的在于向学界推介近期出版的优秀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其二为对本论丛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批评及作者对批评的回应,旨在加强学界的理论互动,为建立健全的学术评价体制尽绵薄之力。

我们希望《社会理论论丛》的出版,能够获得学界的呼应和支持,并由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

社会理论论丛

■学术顾问

杜维明 金耀基 郑杭生

■主 编

张一兵 周晓虹 周 宪

■编委会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少明 冯 钢 侯钧生 倪梁康 阮新邦 沈 原
苏国勋 王铭铭 谢立中 谢遐龄 许 钧 叶启政
张德胜 张凤阳 张一兵 郑文龙 周 宪 周晓虹

■主编助理

成伯清 谢燕清 徐 彬

■编委会地址

中国·南京汉口路22号
南京大学逸夫管理科学馆四楼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邮编: 210093
电话: 86-25-3592801
传真: 86-25-3594343
电子信箱: sttheory@nju.edu.cn

目 录

卷首语

专题研讨:重返经典之门

- 从沟通理性角度解读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李洁文(1)
另一种精确
——齐美尔社会学方法论札记 …………… 成伯清(24)
诸神之争与知识人
——经典知识社会学中的两个核心问题 …… 徐 彬(45)

学术论文

- 叙述的复兴
——历史社会学及其发展 …………… 卢晖临(66)
社会的世俗化与宗教性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
——宗教社会学有关现代宗教的理论探讨
…………… 范丽珠(114)
当代华人有几儒
——儒人理念型的构造及大陆、港、台三个地区的调查分析
…………… 张德胜等(151)
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 任剑涛(173)

海外文稿

- 技术的轴心时代 丹尼尔·贝尔(204)
现代生活的审美 戴维·弗莱茨比(277)

学术随笔

- 从芝加哥到萨林斯的世界 王铭铭(297)

批评与回应

- “碎片”的整合
——评斯科特·拉什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
..... 许苏明(318)
- 稿约 (325)

从沟通理性角度解读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李洁文*

一、概 论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立场,其中三点就是:第一,要建立起一套沟通哲学(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或互为主观哲学,philosophy of intersubjectivity)来代替传统的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第二,在社会分析上提出要将意义的诠释与行动结果的分析互相划分开来,从而建立起一套所谓体系分析(systems analysis)与意义诠释互相配合的“二层次社会理论”(two-level theory of society);第三,在解释社会现代化时,要在概念上分开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现实的历史。最后这一点尤为重要,对哈贝马斯来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现代化真正的弊病,同时也看到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计划(project)——自我延续下去和解决自己所派生出来的问题的潜在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代化有恰当的评价。

笔者认为,这三点正是哈贝马斯在他的《沟通行动理论》第一、二册里评论及重建韦伯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所在。“理性”与“社会理性化”都是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里的关键概念,这三点也

* 李洁文,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可以成为厘清他们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差异的基础。本文将顺着这个方向首先介绍韦伯的社会理论,然后引介哈贝马斯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他的沟通行动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内容,则有待另文介绍。

二、行动、理性与现代化:韦伯的角度

本部分会概括地介绍韦伯的社会理论,为下文评介哈贝马斯对韦伯的社会理论的评述,提供一个平台。为了这个目的,本部分将不打算全面和完整地引介韦伯的理论。本部分将会就哈氏在他的理论架构下解读韦伯社会理论时所触及的内容,首先作一简单的介绍,其他的内容则在此不赘。

韦伯跟随着德国新康德主义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社会现象是由人的行动和互动组成的,它们承载着行动者所赋予它们的意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行动有别于生理行为和其他自然现象。因此,理解人的行动便必然地涉及意义(或价值)问题;自然科学则否。

虽然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行动包含着一个意义层面,但是当他在处理意义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进而处理意义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他却只将意义问题还原到行动者的信念和意向问题来加以理解。顺着这个思路,韦伯认为,要理解一个行动的意义,便要理解行动者背后的信念和意向;当然,理解了这个行动的意义并不等同于为这个行动提供了一套解释(explanation),对韦伯来说,这更涉及对行动的因果分析。问题是在于,虽然社会科学的目的最终是要为社会现象提供解释,但既然社会现象是由于行动组成的,解释社会现象便必然地、无可避免地涉及理解这些行动背后的信念和意向。^①

虽然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必然地涉及行动者的信念和意向,他却并不认为理念是行动的惟一或最终的推动因素。在他的一个常

被引用的名句里,他提出了一套非观念论(non-idealist)的观点。他认为,理念(ideas)与旨趣(interests)共同地支配著人的行动;后者包括物质旨趣(material interests)和理念旨趣(ideal interests)。^②韦伯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纯粹由理念或物质因素理解社会现象。^③

那么,在韦伯的观念下,理性又在行动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韦伯也从手段和目的角度来解释行动。对韦伯来说,在行动里,理性的角色可以是在事实层面上对各种手段的效度(validity)作判断,即对它们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作判断。它的角色也可以是对行动者的想法和选择,作概念和逻辑上的厘清;这有助于厘清它的行动目的。然而,目的的确立最终是价值判断上的事情,它本身不是事实、概念和逻辑上的问题,它是在理性所能掌握的范围以外。

这种说法正反映出,韦伯的行动观是预设着一套特殊的理性观和价值观。在这套特殊的观念下,理性在行动里所扮演的的是一个工具的角色,理性与客观的事实是互相紧密地结连着的,而这些东西却又与主观的价值互相二元划分。然而,韦伯这些观念却有可争议之处;下文会介绍哈贝马斯对这套看法的观点。

韦伯从来没有认为所有行动都是理性的,实际上,有些行动是被情绪或传统所驱动或支配的。如果,比如在社会理性化的处境下,行动越理性化,则它便越少被这些因素支配,而有更多的理性因素介入。不过,在现实的处境下,完全由理性因素所驱动的行动是绝无仅有的。^④

在韦伯庞大的社会研究体系里,我们不难发现,理性概念不单出现在微观的行动理论里,它也出现在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分析里。不过,虽然‘理性’是韦伯社会理论的其中一个核心概念,但他从来没有在他的著述里为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明显地,这个概念在微观层面上所表达的意义和它在宏观层面上所表达的意义,是有着重要的异同的;韦伯却没有澄清这个情况。^⑤

厘清韦伯的理性概念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层面上所包含的

意思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但简略而言之,当韦伯谈到社会理性化时,他着眼的是社会上各个价值领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的理性化历程。^⑥在理性化的历程里,社会上各个价值领域会逐渐摆脱传统的约束互相分化开来,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发展出自己的内在动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在这种发展下,那些价值领域之间会因着它们在逻辑和目标上的差异愈来愈大,而彼此间产生愈来愈大的张力,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排拒的可能性会愈来愈高。不过,一般而言,各个价值领域间互相分化、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拒的程度如何,和它们如何发展出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动力,则因各个社会环境之不同而各有差异。

韦伯正是依循着这套观念来分析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或理性化历程。在这套分析下,他一方面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及成果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是特异的(peculiar),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它是有着它的普同意义和价值(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的。^⑦这种发展如何能够同时是特异的,且又具有普同意义的,正是一个值得在下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发展是多层面的。在这个历程里,虽然各个价值领域逐渐有着自己的独立发展,它们之间却也有着一种所谓选择性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在一个特定的处境下互相构成影响,而产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那种特异的现代社会的面貌。韦伯注意到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多层面特性,也尝试在各个层次上分析这个发展历程的各种特性,如理性资本主义、理性的科层制度、现代理性法律、现代科学与科技、现代理性音乐等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交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显然地收窄了他的分析重点,他对西方社会宗教领域(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发展却作了在比较上颇为仔细的分析。在韦伯的分析下,在由古犹太教发展到中世纪天主教以至禁欲新教的这个宗教理性化历程里,基督宗教愈是理性化,它排拒现世的程度便变得愈来愈大,它与其他价值领域间的张力也因而变得愈来愈大。然而,从韦伯

的角度来看,基督宗教这种理性化发展在信徒间催生了一种反传统的、而且又是贵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种高度自我纪律、自我计划的工具性的生活方式,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趋势。这种发展正与基督宗教所重视的弟兄爱互相抵触。然而,基督宗教这种伦理价值和生活方式却为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先决条件。这种由宗教理性化发展所带动的伦理理性化发展与其他相关的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发展,共同地形成了一种韦伯称为“选择性的亲和性”的相互关系,在西方社会里孕育出一种在世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理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这种发展是特异的,只在西方社会内部引发出来。然而,宗教理性化发展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的作用。当理性资本主义制度化确立后,它便不再需要禁欲新教这种理性化宗教作为它的助缘。在工业生产和商贸活动变得愈来愈理性化的时候,它们会愈来愈将专注力放在提高物质成就的目标上,而逐渐地排挤其他的实质价值(诸如宗教理念和道德价值),它们会逐渐地变得与这些活动愈来愈互不相关。从韦伯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理性化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在理性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地在社会上取得愈来愈主导性的地位的时候,基督宗教伦理价值却逐渐地从这个体系被排挤出来,它们的社会角色因而收缩,这正是宗教理性化的一个悖论(paradoxical)之处。

随着西方社会迈向理性化的发展方向,社会内各个价值领域会因着它们愈来愈理性化,它们会愈来愈摆脱传统的约束而独立地发展开来,而建立起自己的发展逻辑和方向,它们的发展幅度也会大为扩展。然而,这些价值领域彼此间也会因此而产生愈来愈大的张力,它们之间曾变得愈来愈难以互相协调,这样便形成了一种韦伯所说的价值间不可相融和价值冲突的局面。这个价值崩离的社会局面容易致使社会成员陷入丧失社会规范和生活意义的状况。而且,因为各个价值领域变得愈来愈理性化,它们内部的活动

便会变得愈来愈制度化、形式化和效率化,对实质的价值信念和个人自由造成愈来愈大的威胁。这正是韦伯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特异于非西方社会之处,同时也是它的悖论和令人困扰之处。

韦伯并不认为这些悖论的历史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后果,他并不相信有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necessity)这回事。相反地,他认为这些发展是特异的,它们并没有在其他社会里引发出来。在西方社会的特殊环境下,顺着社会内各种价值领域特异的理性化发展逻辑,这些悖论的历史后果的出现却是自然的。韦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或理性化)的看法并非纯然是乐观的,也并非纯然是悲观的。他一方面肯定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成效和社会活力,他另一方面又承认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危机,这些危机正是现代人所需要不断地、不可讳言地面对的。这个观点正反映出韦伯的社会思想的悲剧英雄的一面。

三、行动、理性与语言

在社会理论界里,上述韦伯那套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分析确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韦伯不像十九世纪社会进化论者那种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步论和乐观主义的看法,也不像二十世纪初提出西方的没落的学者那种悲观主义的观点,他尝试采取一个较平衡的衡量角度来看待西方社会现代化。虽然韦伯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他却仍认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特别是理性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它普同的意义和价值,有着它普遍性的一面。对哈贝马斯来说,这些正是韦伯的社会理论可取之处。^⑥不过,韦伯对一些关键概念(特别是“理性”)的运用,欠缺清晰的界定,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解释,也未够全面。故此,哈贝马斯以他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采取了一个他称为“重构性”(reconstructive)的角度来批判、补充和重整韦伯的社会理论。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角度来阅读哈贝马斯在他的《沟通行动理论》里对韦伯的分析时,我们

会留意到,其中一个较贴近哈贝马斯的用意来阅读他的分析的理解角度,就是要看他从韦伯那里找到那些具启发性的理念,并且如何从这些理念建构出他自己具原创性的观点,多于要看他如何阐述韦伯的原意。^⑧

下文会从行动意义与理性概念、社会理性化和现代的悖论三方面,探讨哈贝马斯对韦伯的看法。

首先,上文提到,韦伯认为,人的行动有别于生理行为和其他自然现象之处,在于行动承载着意义,后者则否,因此,理解行动必然地涉及意义问题;这一点的争议性不大。然而,当处理行动意义问题时,韦伯并没有进一步处理语言与意义间的关系问题,而却简单地认为,行动的意义是由行动者所决定的,行动的意义是包含在行动者的行动意图之内。似乎对韦伯来说,行动者背后的意图就是行动的意义。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些意图亦反映着行动者背后的一些信念、动机等。因此,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行动者的意图、信念、动机等都会必然地、无可避免地被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无可否认,理解行动经常会涉及行动者的意图,但是,只掌握行动者的意图并不足以掌握行动所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其实,理解行动者的意图本身已预设着理解者已掌握了许多其他相关的认识,而这部分正是上述那套韦伯所认同的行动观所没有顾及的。从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那套行动观的缺点正是在于它犯了两个哲学上的错误。首先,这套行动观预设了一种纯粹地从主-客关系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思维模式,^⑨去理解行动者与行动意义间的关系。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理解者所关注的是行动者为自己的行动下意义这个环节,他也以这个环节为理解行动意义的关键之处。其次,这套行动观亦含蕴着一个所谓意识哲学的立场。在这个哲学立场下,理解者会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到意识层面(在韦伯的行动论里,即行动者的意识)去掌握它们的意义;其实,根据这个哲学立场,所有知识和存在的基本特性,都可以透过这种还原的方法

被加以掌握。这两种分析方法会倾向于将行动主体绝对化或将它从它本来的存在处境中孤立出来,来掌握社会现象的意义的产生。在视野上,这种做法显然地是褊狭的,它使我们忽略了主体和意识都预设了一个使它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相关脉络,它们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关的社会和语言环境之上。那种哲学观念使我们忽略了这个情况,因而阻碍着我们去掌握行动意义丰富的一面。

对哈贝马斯来说,要摆脱韦伯那套行动论上述的限制,便要摆脱它背后那些哲学思维模式,这正是哈氏发展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哈贝马斯参考了英美语言哲学、现象学和哲学诠释学的看法,认为如果我们要恰当地理解行动的特性,我们便不应只将它联系到行动者这方面来理解它,我们更要厘清它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关系。这种转变正是包含着一种哲学角度上的转向,就是从一种结合了意识哲学和纯粹地以主-客二元划分的分析角度来理解事物的哲学角度,转换到一种哈氏所所谓的互为主观哲学或沟通哲学上。因此,理解的基础不再是主体或意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为主观和沟通特性——人的语言行为和日常的生活实践正处处反映着这个特性。这个特性并不是单纯以意识哲学或主-客思维所能掌握的。

从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我们将行动放置在生活世界里,并且面对它的语言特性,我们便可以看到它的互为主观和沟通的特性。首先,所有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的生活实践都与语言分不开,这两者间有着一种非常密切的、互相建构的关系。每一个人一出生,便生活在一个生活世界(lifeworld)里。她的成长过程就是她学习语言、思想和行动的历程,也正是她不断地内化(internalize)生活世界里的社会知识、规范、价值等,和学习融入社会的历程。这个不断地累积下来的社会知识库(social stock of knowledge),会支援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和规范着她的行为模式,也会成为她理解自己、表达自己和建立自己的生活意义的资源。她通常都不会质疑这套知识的效度,除非她在一些互动的情境下